

· 文学史研究丛书 ·

情与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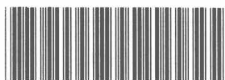
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

〔美〕 孙康宜 著
李爽学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560016



CS1710587

· 文学史研究丛书 ·

情与忠

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

I207.2^[美] 孙康宜 著
0201 李夷学 译



I207.2

0201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重庆师大图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美)孙康宜著;李奭学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2

(文学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1645-3

I. ①情… II. ①孙…②李… III. ①诗词-诗歌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1883 号

书 名: 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

著作责任者: [美]孙康宜 著 李奭学 译

责任编辑: 徐丹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645-3/I · 255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 × 1230mm A5 8 印张 202 千字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平原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 20 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惟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

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研究”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学通史”），其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尽可不必画地为牢。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也都各具面目，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但生气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鲁迅先生始。”当初的处女地，如今已“人满为患”，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胡适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今日中国学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适的“三原则”，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

当初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今日中国，能否有此迹象，不敢过于自信，但“新世纪”的诱惑依然存在。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

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20世纪的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省。

反省之后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

1999年2月8日于西三旗

北大修订版自序

本书的英文版(*The Late Ming Poet Ch'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于199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的繁体版(李爽学译)则于次年由台湾的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转眼间二十年已经过去。如今事过境迁,我抚今追昔,终于有机会重读旧作,并随读随订。因而有了出版一本较为完整的修订版之想法。

这本北大修订版之所以能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陈平原教授,是他多年来的热心和执著的建议才使其终于如愿地出现。同时,我也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张凤珠女士的大力支持以及编辑徐丹丽的努力。对于台湾允晨文化公司发行人廖志峰先生的授权,以及黄进兴博士的帮助,我同样献上感谢。

这些年来我也衷心感谢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张健、严志雄(Lawrence Yim)等人对拙作的继续批评和鼓励。同时,胡晓明先生在一篇有关拙作的书评里,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认为本书“最引人注目”的新意,是其“大力揭示”所谓“情”与“忠”合一的诗学观。他说,从前在表达这一种批评概念时,人们往往容易陷入三种困境——(1)主观印象主义;(2)缺乏传记文献与史料的实证;(3)过于附会于某一人或某一事。但他说,拙作在其“理论进路”、“细心的文本解析”以及“适当的史学依托”的种种配合下,却能“有效地避免了上述困境,成功地完成了一个情忠合一的诗学阐释”,进而“将一个几乎过时的诗学遗产,重新唤醒里头古老的生命”。因此他认为,拙作当初的中文

译名《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实不如原著英文书名更为符实”。他这个建议很令人信服，所以我和译者李爽学先生就为本书起了“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的新名。

必须说明：在他的书评里，胡晓明先生也同时表示对拙作的一些问题和缺失感到“遗憾”。他那些诚恳的批评开导激励了我现在改写书中许多段落的决心。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如谢正光、孙赛珠等）先后撰文指出拙作的一些错误，并供给宝贵资讯。这些批评和指正极有利于本书的修订，我已在书中一一注明，表示感谢。

近年来我努力研究中国古典妇女文学，今日回想起来，其最初的原动力实自撰写本书的英文版开始。研究柳如是，不得不熟读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同时也不得不考虑到晚明妇女的新形象；通过文学分析，我开始对中国传统的性别观感到兴趣。此外，这些年来从女诗人选集及专集的广泛涉猎中，我逐渐对所谓“女性”文学的传统有了较清楚的概念。我发现，自明末以后，妇女诗词选集的刊行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而所谓“名媛诗词”实已成了当时的畅销书。明清时代虽无今日意义上的“妇女研究”，但从当时男性文人对女性文本的迷醉上来看，我们可以说，编选和品评女性诗词本身就是一种广义的妇女研究。对现代的研究者来说，阅读这些女性选集绝不可仅限于作者生平及历史考古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从旧的文本中发现出一些“新”的东西，进而“重读”当时才女的写作与生活。

在明末清初的才女中，柳如是算是一位对编纂女性选集特别有贡献的人。虽然她从事编选的工作是在她离开陈子龙多年之后（即嫁给钱谦益之后）才正式开始的，但我相信本书的读者会对这个题目感兴趣。因此，我在本书“附录”中加上一篇与女性选集有关的拙作：《明清女诗人选集及其采辑策略》（原作为英文论文，由台湾大学外文系的马耀民先生译成中文）。

此外，我要向施蛰存先生（已于2003年去世）致上谢意：作

为一个松江人(与陈子龙同乡),他不断教给我许多有关松江的历史及文化知识。1996年6月,他还特别安排让我亲自参观陈子龙和夏完淳等人的墓园,使我多年来的梦想终于成为事实。

最后,我也要对我的恩师高友工教授以及朋友李纪祥、张宏生、康正果等人表达我的谢忱。当然还更应当向译者李爽学献上最大的谢意。如果不是他二十多年前竭尽全力将拙作英文版译成中文,也就没有今日这个修订版《情与忠》的出版了。对于爽学的学问、功力和为人,我是永远佩服的。

2012年11月于耶鲁大学

译者原序

学术性著作可以写得高深莫测,令人如坠五里云雾之中,也可以写得朗朗上口,雅俗共赏。本书深入浅出,应属后一范畴,文史学者或一般读者,相信阅后都会受益匪浅。今年元月孙康宜教授把英文版样书寄给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如上述。接书当晚,我摒开杂事,一口气读了半数章节。隔天微明即去函孙教授,奉知我很乐意从事她所托付的中译工作。如今梓行在即,我应趁此机会感谢一些识与不识的本书幕后功臣。

首先要致谢的当然是孙教授本人。我从未见过像她那样兼具耐心与细心的“审稿人”。我每译完一编,总会把手稿寄到新港请她指正,而她的工作效率惊人无比,在研究、教学与行政工作三忙之际犹能“逐行逐字”检视一过。我遍寻不获的原引文,她也不惮其烦从藏书或图书馆检出补正。她不曾因身为美国一流学府的系主任而摆起姿态,对后学仍然有请必应,有问必答,而且一丝不苟。本书文体当然是我的,但内容若无讹舛,孙教授当居首功。

在本书书序中,孙教授已经向允晨出版公司的杨志民经理致谢,我还应该向该公司图书组组长廖志峰先生特致谢忱。本书相关事项几乎都是他在幕后执行;他的专业经验也帮我省去很多编辑上的难题。允晨公司内参与编校的工作人员,在此并申谢悃。

翻译本书之前,我和耶鲁大学素无渊源,然而因为本书中译计划与孙教授的奔走,耶鲁在我尚未完成工作之前,就先赠我一

2 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

笔翻译与研究奖助金,使我更能全神投入工作。饮水思源,我的感激自是难以言表。此外,本书书末的书目资料乃内人静华一手整理,在翻译的过程她也给我许多文体上的建议,镌版后又全程参与校对工作。这种种襄助岂是片言只语就可道谢得了?仅志于此,聊表寸心。

李爽学 谨识

1991年9月·芝加哥大学

年谱简表(公元纪年)

- 1608 陈子龙生于松江。其母于产前夜梦神龙大放光明,寝室生辉,产后因命名“子龙”。
- 1612 陈母亡,遗孤托祖母高太安人抚养数年。
- 1613 陈子龙启蒙,始读经籍。
- 1615 陈子龙开始诗教,诗联对仗无一不习。
- 1618 柳如是生。
- 1619 陈子龙文定,对象是宦门名儒张方同长女。
- 1626 12月,陈子龙父卒,他正式成为一家之主。
- 1628 陈子龙服孝期满,迎张氏入门。
- 1629 陈子龙加入以张溥为首的复社。
- 1630 陈子龙至金陵赴省试,中举。
- 1631 陈子龙赴京师会试,不第。
- 1632 陈子龙遇柳如是。
- 1634 陈子龙再赴会试,仍不第。
- 1635 春夏:陈子龙与柳如是同居南园。
秋:柳如是被迫离开陈子龙,后重返盛泽伎馆。
- 1637 陈子龙三赴会试,进士及第。是年继母丁忧,他未及奉派即请返乡服丧。
- 1638 柳如是刊刻《戊寅草》,陈子龙为其撰《序》。
- 1640 陈子龙始任公职。
- 1641 柳如是适钱谦益。
- 1644 清兵陷京师。柳如是在黄媛介画上挥笔题下陈氏赠诗。

2 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

- 1645 清兵陷金陵。柳如是投水自裁，获救。
- 1646 陈子龙祖母去世，他即请加入吴易领导的义军。
- 1647 陈子龙加入吴胜兆的抗清运动，五月殉国。
- 1648 柳如是加入黄毓祺的抗清运动。
- 1649 钱谦益编《列朝诗集》，柳如是代其编成女诗人部分（《闺集》）。
- 1654 柳如是助郑成功进兵长江地区。
- 1659 柳如是劝服其他明室遗民加入金陵的郑氏所部。
- 1664 钱谦益亡，亲族需索无度，柳如是自杀抗议。

重要书目简称

- 《安雅堂》 陈子龙,《安雅堂稿》,三册重印本,台北:伟文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
- 《全宋词》 唐圭璋编,《全宋词》,五卷本,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 《诗集》 陈子龙,《陈子龙诗集》,施蛰存和马祖熙合编,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全唐诗》 彭定求(1645—1719)等编,《全唐诗》,十二卷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 《汇编》 林大椿编,《唐五代词》,原版于1956年刊行,重印改题为《全唐五代词汇编》,二卷本,台北:世界书局,1967年。
- 《先秦》 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三卷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 IC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ed. and comp.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86.
- 《别传》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丛编》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五册重订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原英文版前言

在陈子龙(字卧子,1608—1647)的诗词中,“情”为何物?“忠”又代表什么?这些问题多年来在我心中萦绕不去,也构成了本书的题旨。我原先只想为17世纪的中国诗词撰一通说,但再三尝试各种诠释的方法之后,我发觉我对当时诗词与文化潮流的兴趣逐渐集中到陈子龙身上。陈氏生当动乱频仍之际,对时代变革也有过人的反应。他的作品乃以想象在记录日常经验,同时也是17世纪中国文化史的重要见证。此外,同代诗人几乎唯他马首是瞻,许为最佳的诗人词客。

常人多以为陈子龙乃明末志士,为国捐躯,九死无悔。陈氏在历史上据有一席之地,无疑这是主因。但是,这一点也有负面影响,因为一般学者仅仅知道他是爱国诗人,不及其他。所以,迄今为止在西方汉学界中,罕有人对陈氏的贡献下过公允的判决,视其整体成就为“文学”者更是少之又少。其人诗词乃重要瑰宝,惜乎学者读者多充耳不闻。“艳情”又为其词作重点,所写尤其关乎诗人歌伎柳如是。他们之间过从甚密,史有信征。然而,传统传记家或为护持陈氏“儒门英烈”的名望,大多搁笔不谈他和柳如是之间的情缘。以明、清学者常常征引的《牧斋遗事》为例,对此便多所扭曲(《别传》,上册:88—89)。当然,陈寅恪的《别传》一出,我们对陈氏的感情生活顿然有较深入的认识。

明人相信,一往情深是生命意义之所在,也是生命瑕疵的救赎梁柱。这种看法便是晚明艳情的中心要旨。此一情观重如磐

石,特殊脱俗,也是内心忠贞的反映。“忠”乃古德,有史以来就是君臣大义,不过本书对此自有新意发微。看在陈子龙及其交游眼里,晚明婵娟大可谓“情”与“忠”的中介:心中佳人乃艳情的激励,也是爱国的凭藉。胸中无畏,“露才扬己”,又是晚明人士理想的女性形象,也深合时代氛围。晚明诸子绝少以为情忠不两立:此事说来话长,但原因全如上述。时势既而两趋,从明到清的文学当然结合两者所长。然而朝代兴革所形成的社会动乱,自然会把两种理想推向崖际。此事尤可想见。

上述课题,陈子龙的诗词多所关注。首先,他和柳如是的情缘革新了情词的方向,是“词”在晚明雄风再现的主因。其次,陈子龙晚期的作品——尤其是他的爱国诗——掀露了中国人的悲剧观:天地不全,人必须沉着面对命运悲歌,义无反顾。在“爱情”与“忠国”之间,诗人尤其要能够掌握分寸。这种辩证性的“最后抉择”往往摧心沥血。再次,陈子龙早年的情词不但不不是绊脚石,反而在晚年为他激发过力撼山河的忧国词作,十分有趣。我尤其想指出陈词以隐喻和象征来表现君国之思的倾向与方法,说明他早期情词如何转化为晚期忧谗之作的词学,最后还要澄清艳词何以是爱国心绪的最佳媒体。在此同时,我也要向读者解明陈氏的秋水伊人柳如是何以变成故国的象征,词人又是如何推衍人类情感,使之成为精雕细琢感天动地的表记,从而强化了忠君爱国的修辞力量。

陈子龙的诗词意义纷呈,包罗万象。我难免特别注意晚明妇女的形象,尤其是她们在当代社会、艺术与文学上所具有的地位。本书目录已经明陈,就算要详说细解陈子龙的诗词,我也有必要让读者熟稔柳如是的生平与文艺造诣。从各方面来看,柳如是都是其时才伎的典范(paradigm),所代表的正是无数艺伎的关怀与才能。在撰写本书的研究过程里,我特别注意柳如是的诗词,尤其着迷于她和陈子龙唱和的“词”。对柳氏或对陈氏而言,生命意义和经验的流通,有赖永无止境的追寻,而诗词正

是这种追寻最活跃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柳如是诗词透露了一些女性问题,为她们重新定位。因此,只要时机得宜,我绝不讳言柳如是的生活与诗词,甚至进而强调她与陈子龙的关系。当然,她博学多闻,想象力与创造力俱属一流。这点更不会逃过我的注意。

拙作还有一个千丝万缕总是不离的强调:诗体的问题。文人对过往体式文类汲汲看重,必然会倾力注意诗体之别,而这几乎便是诗人传达个人声音最有力的策略。体式的问题一旦求得解答,我们即可据以了解诗人对传统的反应为何,甚至也可以认识他个人美学观的倾向。本书目之一,就是要说明陈子龙所写的诗、词皆有其个人情爱与家国之思的双重强调:在他笔下,诗、词恰可传递“情”与“忠”的“不同”层面。我兴致特别盎然的地方,在陈氏所欲表达的意义往往随着诗体的变动而变。这也就是说:陈词常常思索得失的问题,但陈诗往往超越了这些问题。我相信类此的文类研究(genre study)是认识陈氏文学贡献的枢纽。就中国诗词的内容而言,这种研究也有更开阔的意义。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用英文撰写陈氏诗词的专著。以中文所作的努力,也是寥若晨星。中国人总以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通俗小说来为时代与文学定位。这种说法甚嚣尘上,却非正确的文类演变辙迹。难怪明清诗词的研究欲振乏力,现代学者多半视若无睹。这种情形也大大扭曲了传统文类发展的本然。事实上,诗、词一旦生发,就不可能会在历史上消失,吟咏填制者反而代有其人。职是之故,本书自感责无旁贷的一点,也就是要填补中国诗词研究上的这个大罅隙。除此之外,从17世纪以迄本世纪初,中国文学史更经历了一场古典诗词的文艺复兴。我敢说词体重振,陈子龙居功至伟。他筹组云间词派,免得明词堕落不振。较诸“词”在南唐(937—975)所处的黄金盛世,陈子龙确实认为明词堕落颓唐,有待振兴。

历来的中国人多认为,从明转清的朝代更替,代表着某种世

界的结束。想想西方长者记忆中的1914年，我们就不难明白中国人这种感觉。明清鼎革是孔尚任《桃花扇》里的一幕，陈子龙的生涯又是此刻历史的另一转折。如同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魏尔士（John Wills）所说的：“清军横扫中国与明人的抗敌运动，为道德典范树立起前所未见的悲剧视境。晚明志士但求为国捐躯，不事二主。在中国的某些通都大邑，时代菁英纷纷投入徒劳无功的战役之中，即使可以伺机再起也不愿后撤。他们拒绝为二臣效力，更不愿变成清廷鹰犬，昂然就义。”^①本书尝试描绘的，就是这么一位为国族押上性命的忠烈英哲。

陈子龙乃不世之才，也是时代的代表。我想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就是这么一个人。陈子龙的诗词大业是否成功，这得由读者揣想评定。但是不容否认，他把“情”与“忠”这两个不同的主题交织成为一体，也把前人传下的风格与体式融通重铸，以便涵容新的内蕴。至于他的诗体革新的成效，仍然有赖读者把脉评估。

孙康宜
1990年于耶鲁

^① Jonathan Spence and John Wills, *From Ming to Ch'ing*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79), xvii-xviii.